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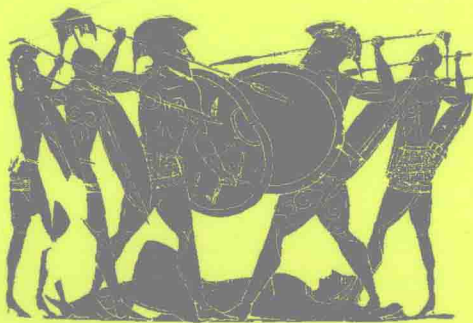
〔古希腊〕荷马 著 陈中梅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Homer

The Iliad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古希腊〕荷马 著 陈北衡 译

译文名著精选

YIWEN CLASSICS



Homer

The Iliad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全2册/(古希腊)荷马著;陈中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0

(译文名著精选)

书名原文:The Iliad, The Odyssey

ISBN 978-7-5327-7343-5

I. ①荷… II. ①荷… ②陈… III. ①史诗—古希腊

IV. ①I54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1046号

Homer

THE ILIAD

THE ODYSSEY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全2册)

[古希腊]荷马著 陈中梅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37 插页 4 字数 623,000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7343-5/I·4475

定价:80.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8506965

序

陈中梅

荷马的身世向来扑朔迷离。有西方学者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荷马其人。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马修·阿诺德曾用不多的词汇概括过荷马的文风，其中之一便是“简明”（simplicity）。然而，这位文风庄重、快捷和简朴的希腊史诗诗人却有着不简明的身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其“庐山真面目”的疑团。首先是他的名字。Homeros 不是个普通的希腊人名。至少在希腊化时期以前，史料中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以此为名的人物。Homeros 被认为是 homera（中性复数形式）的同根词，可作“人质”解。Homeros 亦可拆解作 ho me (h) oron，意为“看不见（事物）的人”，亦即“盲人”。这一解析同样显得勉强，也许是根据《奥德赛》里的盲诗人德摩道科斯所作的类推，把荷马想当然地同比为古代歌手中不乏其人的瞽者。细读史诗，我们会发现荷马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对色彩的分辨尤为细腻。荷马的名字还被解作短诗的合成者。有学者试图从 Homeridai（荷马的儿子们，荷马的后代们）倒推 homeros 的成因，所作的努力值得嘉许。然而，此类研究也可能走得过远。比如，历史上曾有某位英国学者，此君突发奇想，竟将 Homeros 倒读为 Soremo，而后者是 Soromon 的另一种叫法，由此将荷马史诗归属到了一位希伯来国王的名下。应该指出的是，从字面推导含义是西方学者惯用的符合语文学（philology）常规的做法，即便尝试倒读人

名，也算不得十分荒唐，只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事实不符乃至南辕北辙，这是我们应该予以注意的。

即便承认荷马确有其人，他的生活年代也充满变数，让人难以准确定位。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提出并满足于自以为能够自圆其说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评估）。从特洛伊战争时期（一般认为，战争的开打时段在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之间）到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从伊俄尼亚人的大迁徙到公元前九世纪中叶或特洛伊战争之后五百年（一说一六八年），都被古人设想为荷马生活和从艺的年代。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荷马的在世时间“距今不超过四百年”，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历史》2.53）；而他的同行修昔底德则倾向于前推荷马的创作时间，将其定位于特洛伊战争之后，“其间不会有太远的年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荷马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人氏？我们所能找到的“外部”文献资料似乎不能确切回答这个问题。另一个办法是从荷马史诗，即从“内部”寻找解题的答案。大量文本事实表明，荷马不生活在迈锡尼时期，因此不可能是战争的同时代人。从史诗中众多失真以及充斥着臆想和猜测的表述来看，荷马也不像是一位生活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的“追述者”。由此可见，希罗多德的意见或许可资参考。但是，考古发现和对文本的细读表明，希罗多德的推测或许也有追求“古旧”之虞。《伊利亚特》6.302—303所描述的塑像坐姿似乎暗示相关诗行的创编年代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八世纪；11.19以下关于阿伽门农盾牌的细述，似乎表明这是一种公元前七世纪以后的兵器；而13.131以下的讲述更给人“后期”的感觉，因为以大规模齐整编队持枪阵战的打法有可能盛行于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后。著名学者沃尔特·布尔克特（Walter Burkert）将《伊利亚特》的成诗年代推迟到公元前六六〇年的做法^①，似乎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赞

^① Martin Mueller, *The Ilia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p. 1. 不排除史诗中的极少量内容得之于公元前六六〇年以后增补的可能。

同。荷马史诗自有他的得之于历史和文学传统的古朴性，零星出现的后世资证和著名学者的“靠后”评论，都不能轻易改变这一点。综观“全局”，我们认为，把荷马史诗的成篇年代定设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或稍后比较适宜，其中《奥德赛》的成诗或许稍迟一些，可能在公元前八世纪末或前七世纪初。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当代学者所持的共识。大致确定了荷马史诗的成诗时期，也就等于大致确定了荷马的生活和活动年代。如果古希腊确实出现过一位名叫荷马的史诗奇才，那么他的在世时间当在公元前八世纪——这一时段定位或许比别的推测更接近于合理，更少一些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可信史料的匮乏（以及误读史料）所造成的很难完全避免的草率。

荷马的出生地在哪儿？这个问题同样不好准确回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均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七世纪也没有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作为信史引证的第一手资料。据说为了确知荷马的出生地和父母是谁，罗马皇帝哈德里安还专门求咨过德尔菲的神谕^①。在古代，至少有七个城镇竞相宣称是荷马的出生地，并且似乎都有各自的理由。它们是斯慕耳纳（现名伊兹米尔）、罗德斯、科罗丰、（塞浦路斯的）萨拉弥斯、基俄斯、阿耳戈斯和雅典。能够成为荷马的乡亲，自然是个莫大的荣誉，尤其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诗人的名望鼎盛，如日中天。但是，荷马的出生地毕竟不可能多达七处，否则我们将很难把他当做一介凡人（只有神才可能有那样的“分身术”）。希腊文化的传统倾向于把荷马的故乡划定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伊俄尼亚希腊人的移民区。任何传统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荷马对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人所知甚少，表明他不是从小在那个地域土生土长的。此外，《伊利亚特》中的某些行段（比如 9.4—5，

^① 参考 Daniel B. Levine, “Homer’s Death in the Biographical Tradition”, *The Classical Journal* 98. 2 (2002/03), p. 141。

11. 305—308) 暗示他的构诗位置可能“面向”希腊大陆(或本土),即以小亚细亚沿海为“基点”。荷马所用的明显带有埃俄利亚方言色彩的伊俄尼亚希腊语,也从一个侧面佐证着他的出生地不在希腊本土或罗德斯等地。再者,作为一个生长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荷马或许会比生活在希腊本土的同胞们更多一些“国际主义”精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叙事的中性程度以及不时流露出来的对敌人(即特洛伊人)的同情心里看出来。上述原因会有助于人们把搜寻的目光聚集到小亚细亚沿海的斯慕耳纳和基俄斯,与传统的认识相吻合。我们知道,阿耳戈斯曾是个强盛的城邦,而公元前六世纪以后,雅典逐渐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和书籍发散地(阿里斯塔耳科斯就认为荷马是雅典人),但历史和文本研究都不特别看好这两个地方,所以即使在古代,它们的竞争力也不甚强劲,无法与基俄斯等地相抗衡。基俄斯的西蒙尼德斯设想基俄斯是荷马的出生地(片断29;他称荷马是一个“基俄斯人”(Chios aner));事实上,那儿也被古代文论家认为是“荷马后代们”(Homeridai)发迹并长期诵诗从业的地方。在古代,荷马被认为是史诗作者(或诗人)的代名词,所有的“系列史诗”(如《库普里亚》、《埃塞俄丕亚》和《小伊利亚特》等)以及众多的颂神诗(如《阿波罗颂》和《赫耳墨斯颂》等)都被认为出自荷马的凭借神助的天分。基俄斯诗人库奈索斯创作了《阿波罗颂》,但却并不热衷于拥享作品的署名权。不仅如此,他似乎还愿意充分利用人们对荷马的感情,凭借人们对荷马的印象,宣称该诗的作者是一位“来自山石嶙峋的基俄斯的盲(诗)人”(tuphlos aner,《阿波罗颂》172)。库奈索斯的做法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他不仅是基俄斯人,而且还是当地“荷马后代们”的首领,率先(公元前五〇四年)向远方输出荷马的作品,在苏拉库赛(即叙拉古)吟诵“老祖宗”的史诗。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相信荷马的家乡在基俄斯,但史学家欧伽蒙和学者斯忒新勃罗托斯则沿用了公元前五世纪同样流行的荷马为斯慕耳纳人的传闻。

抒情诗人品达的“视野”似乎更显开阔，既认为荷马是斯慕耳纳人（片断 279），也愿意“折中”，即接受荷马同时拥有基俄斯和斯慕耳纳双重“国籍”的提法。有人认为荷马出生在斯慕耳纳，但在基俄斯完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相传荷马卒于小岛伊俄斯，该地每年一次，在一个以荷马名字命名的月份，即 Homereon 里用一只山羊祭奠诗人的亡灵。

荷马的名字绝少见于公元前七世纪的作品史料。学问家鲍桑尼阿斯（生活在公元二世纪）在谈到史诗《塞贝德》时写道：“卡莱诺斯曾提及这部史诗，并认为此乃荷马所作。”（ephesen Homeron ton poiesanta einai，《描述希腊》9.9.5）一般认为，卡莱诺斯即为厄菲索斯诗人卡利诺斯，其活动年代在公元前七世纪上半叶，以擅作对句格诗歌著称。如果卡莱诺斯即为卡利诺斯的推测不错，那么鲍桑尼阿斯的引文或提及很可能是现存惟一的一则比较可信的可资论证一位公元前七世纪诗人提及（原作当然早已佚失）荷马名字的珍贵史料。需要指出的是，卡利诺斯不太可能称荷马编了《塞贝德》，因为这部史诗的成文年代很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纪。卡利诺斯的意思或许是，他知晓发生在塞贝的战争，而荷马作为一位史诗诗人，编述过关于那场战争的故事^①。一位生活年代不迟于公元三世纪的拜占庭评论家曾提及阿耳基洛科斯的观点（片断 304W.），称这位诗人相信《马耳吉忒斯》乃荷马的作品。阿耳基洛科斯同样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但考证表明《马耳吉忒斯》的创作年代当在公元前六世纪初以后，所以拜占庭评论家的论述显然有误，与事实不符。阿耳基洛科斯或许知晓荷马，但他的诗作已基本佚失，使我们无法就此进行准确的辨析。有趣的是，“傻瓜史诗”《马耳吉忒斯》长期被古代文家们认定为荷马的作品。我们知道，迟至公元前四世纪，像亚里士多

^① 参考 M. L. West, “The Invention of Homer”, *Classical Quarterly* 49.2 (1999), p. 377.

德这样的大文论家依然对此深信不疑，将《马耳吉忒斯》看作是喜剧的“前身”（参阅《诗学》4. 1448b38—1449a2，另参考《尼各马可斯伦理学》6. 7. 1141a14）。同样伪托公元前七世纪诗人提及荷马的还有另一见例。著述家菲洛科洛斯（出生在公元前三四〇年以前）引用过据说是出自赫西俄德的三行诗句（片断〈dub〉357M.—W.），其中包括“我与荷马在德洛斯高歌”，“唱颂莱托之子、持金剑的福伊波斯·阿波罗”等词语。菲洛科洛斯肯定是凭借道听途说编叙的，他的离奇说法在古代就没有什么信奉者，当代学者更不会把它当作严肃的史料加以引用。赫西俄德确曾参加过诗歌比赛并且获奖，但地点是在卡尔基斯，不是在德洛斯，而他的对手应该也不是荷马，否则很难相信他会在对那次歌赛的记述中放过这一宣扬自己的绝佳素材，不予提及（参阅《工作与时日》654—659）。尽管如此，在公元前七世纪，荷马不是默默无闻的。据说诗人忒耳庞德耳曾在斯巴达吟诵荷马的诗作，图耳泰俄斯、阿尔克曼和阿耳基洛科斯等诗人都吟诵过《伊利亚特》或《奥德赛》里的诗行。也就在同一时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的某些内容已见诸瓶画。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诗人的引诗有可能出自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即已成诗流行的短诗，而这些诗段也是荷马用以加工并构组长篇史诗的原材料。同样，瓶画艺术家们也可能取材于荷马史诗以外内容近似的故事，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后，使其成为可视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景观形象。

荷马的得之于传统的历史真实性在公元前七世纪没有受到怀疑。尽管如此，荷马的名字在那个时期成文的作品中非常罕见，这或许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人们的疑虑，也可能与存世作品的稀少不无关系。公元前六世纪初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质的改变，荷马名字的出现率大幅度提升，仿佛人们突然意识到荷马的重要，觉得既然可以随意复诵或吟诵他的诗行，就不必忌讳提及他的名字，不必再对荷马的历史真实性存有戒心。或许，“荷马后

代们”的活动逐渐开始发挥作用，不断扩大着荷马的影响，最终会同其他因素，使荷马的名字进入千家万户，成功塑造了一位“诗祖”的形象。在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荷马是否确有其人已经不是问题。人们热衷于关注的是荷马的功绩（以及功绩有多大），此外便是他的过错。人们开始评论荷马。有趣的是，得以传世至今的对荷马及其诗歌最早的评论，不是热切的赞颂，而是无情的批评。科洛丰诗人哲学家塞诺法奈斯抨击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神学观，指责他们所塑造的神明是不真实、有害和不道德的（片断 11、14、15）。大约三四十年之后，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以更严厉的措词狠批荷马，认为荷马应该接受鞭打，被逐出赛诗的场所（agones，片断 42）。据传毕达哥拉斯曾在地下里目睹过荷马遭受酷刑的情景。故事的编制者显然意在告诉世人：荷马为自己对神祇的不体面描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类传闻荒诞不经，自然不可信赖，这里略作提及，或许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后世某些哲人对荷马以及由他所代表的诗歌文化的憎恨程度。公元前六世纪，新兴的逻各斯（logos）及其所代表的理性思想开始在希腊学界精英们集聚的城邦里传播，哲人们显然已不满于荷马史诗对世界和神人关系的解释，迫切想用能够更多反映理性精神的新观点取代荷马的在他们看来趋于陈旧的“秘索思”（mythos，“诗歌”、“故事”）。在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哲学对诗歌的批评，自然会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荷马，这一点不足为怪。当然，哲人们本来或许可以把语气放得温和一点，这样既可以显示风度，又能给从来无意攻击哲学的诗歌保留一点面子，还能为自己日后向诗歌的回归（至少是靠拢，如或许指望用自己的诗性哲学取代荷马的传统诗教的柏拉图所做的那样）提前准备一条退路。

真正有意将荷马扫地出门的哲学家只是极少数。荷马对希腊哲人的潜在和“现实”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不敢断定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在提出水乃万物之源观点之前是否受过荷马关于大洋河俄开阿诺斯是众神之源的见解（《伊利亚特》14.246）的启示，

但后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某些成员热衷于引用荷马的诗行以论证自己观点的做法，却是古典学界广为人知的事实。苏格拉底的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斯对荷马史诗的喻指功能兴趣颇浓，而他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对荷马的敬重和赞扬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曾赋诗赞美过老师柏拉图，但比之他在《诗学》里热情讴歌荷马及其史诗的话语，他对柏拉图的赞扬不仅显得零碎，而且肯定不够具体。就连有意把荷马史诗逐出理想国的柏拉图本人，也对荷马怀有深深的景仰之情，并且会在行文中情不自禁地信手摘引他的诗句，以佐证自己的观点。柏拉图对荷马史诗的喜爱一点也不亚于奥古斯丁对维吉尔作品的喜爱，只是二者都出于维护各自政治和宗教理念的需要，不得不努力遏制自己的“情感”，服从“理性”的支配，转而攻击或批判自己原本喜爱的诗人。

就在少数哲人批贬荷马的同时，诗人们却继续着传统的做法，就整体而言保持并增加着对荷马的信赖和崇仰。西蒙尼德斯赞慕荷马的成就，认为由于荷马的精彩描述方便古代达奈英雄们的业绩得到了彪炳后世的传扬。在说到英雄墨勒阿格罗斯在一次投枪比赛中获胜的事例时，他提到了荷马的名字，用以增强叙事的权威性：“荷马和斯忒西科罗斯便是这样对人唱诵的。”（参阅《对句格诗》11.15—18，19.1—2，20.13—15）埃斯库罗斯谦称自己的悲剧为“荷马盛宴中的小菜”（阿塞那伊俄斯《学问之餐》8.347E）。我们了解埃斯库罗斯对悲剧艺术的卓越贡献，认可他的作品所取得的高度的艺术成就。他之所以这么说，固然是考虑到荷马史诗的规模和数量（在当时，荷马被普遍认为不仅仅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但同时可能也是出于他对荷马的敬重和叹服。他不认为自己的成就可以与荷马相提并论，故用了“小菜”（或“肴屑”）一词。当然，从埃斯库罗斯的形象比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纳入荷马的“系统”（柏拉图称荷马为第一位悲剧诗人），以能够成为荷马传统的一部分而感到光荣。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感情还是气质或

(行文)“品格”来评判,埃斯库罗斯都秉承了荷马的遗风,是最具荷马风范的悲剧诗人。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同样崇仰荷马。他赞赏荷马的博学,不怀疑他在希腊民族中所处的当之无愧的教师地位,誉之为“神圣的荷马”(theios Homeros,《蛙》1034)。抒情诗人品达摘引荷马,赞同当时流行的荷马是史诗《库普里亚》作者的观点(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希罗多德是把《库普里亚》删出荷马作品的第一人,《历史》2.117),并称荷马把这部史诗作为陪嫁,将女儿嫁给了库普里亚(即塞浦路斯)人斯塔西诺斯。品达对荷马并非没有微词,但是,他的批评是含蓄而合乎情理的,有别于同样多次提及荷马的赫拉克利特对他的恶毒攻击(当然,在崇尚言论自由的古希腊,这么做是允许的)。品达认为,荷马拔高了古代英雄们的形象,以他典雅和瑰美的诗句使奥德修斯受到了过多的赞扬(《奈弥亚颂》7.20—21)^①。

希罗多德引用荷马史诗十一个行次。此外,作为书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最早见诸他的著述(《历史》5.67)。修昔底德引《伊利亚特》仅一个行次,但引《阿波罗颂》的诗行却高达十三例。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是把《阿波罗颂》当作荷马史诗加以引用的。这表明他也像许多前辈文人一样,将包括《阿波罗颂》在内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荷马诗颂》的众多颂神诗都看作是荷马的作品。这种情况在公元前四世纪发生了改变。亚里士多德似乎已不认为《阿波罗颂》是荷马的诗作,尽管他仍然把《马耳吉忒斯》归入荷马的名下。当柏拉图和塞诺芬提及荷马史诗时,他们的指对一般均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引诗行似乎也都出自这两部史诗。从现存的古文献来看,雷吉昂学者塞阿格奈斯(Theagenes,活动

① 品达三次提到荷马的名字。品达的提及客观上起到互相“增光”的作用,使两位大诗人(即荷马和他本人)相得益彰(参考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edited by Ian Morris and Harry Powell,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1997, p. 39)。

年代在公元前五二五年前后)是希腊历史上著述研究荷马史诗的第一人,所著《论荷马》以讨论荷马史诗的“喻指”功能为主,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已失传。他提出的荷马史诗里的神祇皆可喻指自然界里的物质或现象的观点,对后世学者解读荷马的影响甚深,斯忒新勃罗托斯(据说他能揭示作品中藏而不露的意思〈*tas huponoias*〉),格劳孔和阿那克萨戈拉斯等人都曾沿袭他的思路,著述或研讨过当时(即公元前五世纪)的学者们所关注的某些问题。柏拉图对荷马史诗颇有研究,但囿于自己的学观取向,他的研究往往多少带有偏见,无助于人们正确和客观公正地解读荷马。亚里士多德写过《论诗人》、《修辞学》、《论音乐》、《诗论》等著作,其中应该包括研析荷马史诗的内容。《荷马问题》是一部探讨荷马史诗里的“问题”和如何解析这些问题的专著,可惜也像上述文论一样早已失传。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他的论诗专著中硕果仅存的一部(当然,他的《修辞学》也间接谈到诗论问题)。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高度评价了荷马史诗的艺术成就,赞扬他“不知是得力于技巧还是凭借天赋”,几乎在有关构诗的所有问题上都有自己高人一筹的真知灼见(《诗学》8.1451a22—24)。罗马文论家贺拉斯很可能没有直接读过《诗学》,但有理由相信他会从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塞俄弗拉斯托斯和其他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成员(如萨图罗斯和尼俄普托勒摩斯等)的著述中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包括对荷马以及他的史诗的评价。包括西塞罗在内的罗马文人,大概也会通过上述途径接触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诗艺观,从而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加深对荷马的印象。

伴随着吟游诗人们(*rhapsoidoi*)的诵诗活动,荷马史诗从公元前八世纪末或前七世纪初即开始从小亚细亚的发源地向外“扩张”,逐渐渗入希腊本土和意大利南部地区。据说鲁库耳戈斯于旅行途中偶遇吟游诗人,由此把荷马诗作引入了斯巴达(参考

普鲁塔克《鲁库耳戈斯》4)。但普鲁塔克所述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据希罗多德记载，鲁库耳戈斯的活动年代在公元前九百年左右；即使依据古代的保守估计，此君的盛年从政时期也应在公元前七七五年以前，因此除非前推荷马创作史诗的时间，我们很难估测鲁库耳戈斯有可能在公元前九世纪或前八世纪初引入荷马史诗，让斯巴达人有那等耳福。然而，鲁库耳戈斯的“引进”或许不实，但吟游诗人和“荷马后代们”的诵诗活动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已形成“气候”，大概不是耸人听闻的虚假之谈。吟游业的发展势必会导致所诵诗作（或故事）在枝节乃至重要内容上出现不可避免的变异。在没有“定本”的情况下，吟游诗人们会各逞所能，即兴增删诵诗的内容，加大异变荷马史诗的势头。据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梭伦曾发布政令，要求吟游诗人们严格按照传统的“版本”诵诗，不得擅作改动。据传公元前五三五年前后，雅典执政裴西斯特拉托斯组织了一个以俄诺马克里托斯为首的诗人委员会，负责收集各种诗段并以传统成诗为标准，基本“定型”了荷马史诗的受诵样本。公元前五二〇年左右，裴西斯特拉托斯或他的儿子希帕科斯下令，将吟诵荷马史诗定为泛希腊庆祭节上的保留项目，由参赛的诗人们依次接续，当众吟诵。裴西斯特拉托斯（或其子）的努力，对规范吟游诗人们的诵诗和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对荷马史诗的校勘工作却远没有因此而中止。柏拉图的同时代人、史诗《塞贝德》的作者安提马科斯校编过荷马史诗。此外，古时还盛传亚里士多德曾专门为他的学生、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校订了一部日后伴随他南征北战的《伊利亚特》。

公元前四世纪末，托勒密家族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利用雄厚的财富资源大力推动并弘扬科学文化事业，鼓励学人重视对古希腊重要文献文本的搜集和整理，在亚历山大创建了规模宏大的图书馆。至菲拉德尔福斯统治时期（公元前二八五至前二四七年），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抄本已达四十万卷（相当于当今八开

本的图书四万册)。图书馆拥有从马耳赛勒斯、阿耳戈斯、基俄斯、塞浦路斯、克里特和黑海城市西诺佩等地搜集到的荷马史诗抄本,其中的大多数或许均成文于对上述雅典(即在裴西斯特拉托斯或其子希帕科斯督导下形成的)校勘本的(有变异的)转抄。荷马史诗研究由此成为显学。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是非勒塔斯的学生、厄菲索斯人泽诺多托斯(大概出生在公元前三二五年)。他校勘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首次将这两部史诗分别节分为二十四卷。在此之前,学者们习惯于以内容定名或称呼其中的部分,所指不甚精确,也难以形成规范。泽诺多托斯著有《荷马词解》(*Glossai*)。和他的校勘一样,此举虽然功不可没,但明显带有严重的个人主观取向,对词义的解析常显不够精细,且过于武断。继厄拉托塞奈斯之后,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生卒约为公元前二五七至前一八〇年)接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职务,继续着由泽诺多托斯在那个时代开创的以论解词义为中心的研究工作。阿里斯托芬是个博学的人,精通文学、语言学、语文学,擅长文本的考证研究,首创重音符和音长标记,在泽诺多托斯和瑞诺斯(Rhianos)校本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改进和完善了校勘的质量。

真正具备严格的学术意识并且能够代表亚历山大学者治学(即荷马史诗研究)水平的,是阿里斯托芬的学生、来自爱琴海北部岛屿萨摩斯拉凯的阿里斯塔耳科斯(生卒约为公元前二一七至前一四五年)。阿波罗尼俄斯卸任后,阿里斯塔耳科斯接受了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的荣誉,也挑起了这一重要职位所赋予的责任。他以更加严肃的态度治学,两次校订荷马史诗(换言之,完成了两套校订本),并在页边写下了大量的评语,其中的许多行句经后世学者引用而得以传世,受到现当代荷马史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作为当时的顶尖学者(ho grammatikotatos〈阿塞那伊俄斯《学问之餐》15.671〉),阿里斯塔耳科斯一生写过八百余篇短文,大都与荷马及其史诗(或相关论题)的研究有关。与有时或

许会夸大比喻的作用，倾向于过度开发喻指的潜力以佐证斯多葛学派观点的裴耳伽蒙学者克拉忒斯不同^①，阿里斯塔耳科斯强调并提倡例证的收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类推（anology）的研究方法，重视文本内部提供的信息资料，避免无依据的立论，不作缺乏语法和可靠语义支持的哲学或哲理引申。阿里斯塔耳科斯建立了自己的学派，他的直接影响力一直延续至罗马的帝国时代，学生中不乏后世成为著名学人的佼佼者，包括修辞学家阿波罗道罗斯和语法学家狄俄尼索斯·斯拉克斯。尽管如此，阿里斯塔耳科斯及其前辈们的工作仍难免带有时代赋予的局限性。他们接过了荷马乃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内的众多古代史诗的作者的传统，接过了荷马的受到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众多学者文人颂扬，因此需要予以维护的名声。他们同样折服于荷马的诗才和传统形成的权威，遇到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往“好”的方面去设想。所以，尽管阿里斯塔耳科斯的研究方法经常是分析的，他的治学立场却是“统一”的，亦即立足于维护荷马的威望以及他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可分割的统一（或“单一”）作者的传统观点。立场决定具体的校勘行为。此外，大学问家的固执和时代赋予的局限也都会导致他误用自信，在释解史诗用语时牵强附会。

无论是阿里斯托芬还是阿里斯塔耳科斯，都没有把荷马的著述范围扩大到希罗多德或亚里士多德愿意接受的范围，而他们的前辈泽诺多托斯则似乎更趋“肯定”和“现代”，将荷马史诗的所指限定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三位学者都不怀疑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尽管亚历山大学者中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反传统的观点。公元前三世纪，

^① 克拉忒斯是一位享有声誉的荷马学者（Homerikos），一位在语法和修辞方面有造诣的批评家（kritikos）。最新研究表明，此君不一定完全赞同斯多葛学派的主张。

学者克塞诺斯和赫拉尼科斯先后对《奥德赛》的作者归属提出异议，认为它与《伊利亚特》很不相同，因此不可能由创编《伊利亚特》的诗人所作。一般认为，克塞诺斯和赫拉尼科斯是最早的“分辨派”学者（chorizontes），他们的态度和观点或许在阿里斯塔耳科斯等正统派学者看来不很严肃，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毕竟，他们率先就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铁定作者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使人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权威学者的有力反驳，或许是因为论证的方法不够学术，他们的观点未能得到后世有影响的学者的重视和积极响应。毫无疑问，史料因严重佚失而造成的匮乏，会“阻碍”我们的视野，“干扰”我们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的见解没有成为近代分析派学者立论的依据，没有对后者的思考产生过质的影响。

公元三世纪，亚历山大已不再是古典学术和文化的研究中心。随着中世纪的到来，曾是一门显学的荷马史诗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经历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沉寂。但丁应该读过荷马史诗（他尊称荷马为“诗人之王”），但肯定不太熟悉历史上作为一门学问的荷马（史诗）评论。及至莎士比亚写作戏剧的时代，人们对荷马及其史诗的了解程度有了较大的改观。莎翁写过一出取材于有关特洛伊战争传闻的悲喜剧《特洛伊洛斯与克瑞西达》，颇得好评，可见当时的伦敦观众已或多或少地具备了接受此类剧作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情趣。与此同时，荷马研究也在欧洲大陆悄然兴起，开始成为学者们谈论的话题。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英、法两国的“书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起到了某种激励的作用，会同其他因素，把欧洲学人的目光引向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内容孰“新”孰“旧”问题的关注，由此启动了新一轮的以荷马史诗为对象的“历史批评”。热奈·拉宾和威廉·坦布尔坦言他们更愿意相信裴西斯特拉托斯执政时期定型的荷马史诗抄本。一六八四年，学者佩里卓尼俄斯提请人们重